

# 武则天金简

向祎

## 金简意外现世

1982年5月21日,河南省登封市唐庄公社王河大队王峪沟农民屈西怀在中岳嵩山太室山峻极峰一带植树造林。收工之后,屈西怀约了同齡的年轻人一起在山里玩放雷石的游戏。当屈西怀用力推开一块巨石时,一件泛着黄色的长方形薄片从石缝中掉了出来,起初,屈西怀以为是当地流行的那种用来包点心的黄纸,可他拿起来在手上一掂,感觉这可不是纸片啊!于是在胳膊上一擦,尘土撒落后,露出了它明晃晃、亮闪闪的真面目,上面隐约还有字迹,在场的十多人争相传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屈西怀只是捡了片铜片,就把它带回了家。

当“铜片”被反复擦拭后,光鉴照人,上面的字迹也清晰可见。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王河大队,村里人纷纷揣测:这有可能是金子,铜会生锈,金子才不会生锈,说不定是件宝贝哩!

屈西怀在山里捡到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文物贩子高价收购开价一路飙升,这对于生活并不富裕的屈西怀来说,绝对是难以抵挡的诱惑。而生于嵩山、长于嵩山的屈西怀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自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土里的东西不是自己家的,是国家的!他不为巨款所动,决定将文物上交给国家。

登封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联合公安、银行、文化等部门共同参与金简的移交工作。因当时文物保管部门不具备保管重要文物的条件,就先先将这件金简存放于登封市人民银行的金库内。屈西怀也因保护和捐献文物有功,获得了登封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匾和奖金。

1985年9月,河南省文物局与登封市文化局、文管所协商,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将其调拨到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收藏。1992年10月,这件文物由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最初被命名为“武则天除罪金简”,后改名为“武则天金简”。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多次在嵩山举行活动,立石碑、刻摩崖,办会饮……留下了很多文字与遗迹。公元696年的腊月,武则天以中国第一位女性帝王的身份前往嵩山封禅。封禅活动主要是通过封禅山川来昭告天下,通达上苍,以彰显帝王统治的功绩。一代女皇为什么与嵩山的关系如此密切呢?这要从嵩山和嵩山文化说起。

《史记》中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表明古人视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天中地心,地位超然。嵩山是中华文明的圣山,夏代的开国之君启就是在嵩山降生的,夏人认为嵩山

河南博物院收藏有一片金简,金简上写明“大周国主武璽”,璽字为武则天自创之字,因此可以明确断定金简属于武则天所有。

金简是古代帝王祭祀封禅所用,武则天为何将金简投至嵩山?她与嵩山又有怎样的渊源?金简发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称作“武则天除罪金简”,那么这件金简真是为了除罪之用吗?武则天认为她自己有什么罪呢?这些疑问推动着世人对于武则天金简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是他们的祖先。周人认为自己是夏人之后,亦视嵩山为圣山。武则天一直以周人后裔而自居,她亦因此定国号为“大周”。武则天在登上皇位后,效法周武王封禅嵩山,更是为庆祝封禅成功,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元年”,并将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取“登封告成”之意,以示其封禅大典大功告成。

武则天虽与嵩山渊源至此,但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不见关于她在嵩山设置金简的任何记载,如果不是屈西怀的意外发现,历史将继续以沉默的方式藏匿这一段前尘往事。

## “除罪金简”欲除何罪?

武则天金简体呈长方形片状,长36.2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重223.5克。金简整体素面无纹饰,正面上刻双钩楷书铭文,自右至左竖3行共63字:“上言:大周国主武璽好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璽罪名/大庚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简文意为:大周国皇帝武璽信奉道教,羡慕长生,故派小使臣胡超到嵩山天门山投掷金简一枚,祈求三官九府能够对武璽除罪消灾。落款为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七月七日。

金简在发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因铭文中“乞三官九府除武璽罪名”字样,而被认为是一通祈求神灵除去罪名的金简,所以最初被命名为“武则天除罪金简”。一生多分析认为,武则天夺取了李唐天下,任用酷吏,对自己的子女亦采用了铁腕的政治手段……她晚年可能有负罪之感,所以才有“除罪”的说法。

但根据学界的不断深入研究,这件金简其实不是一通除罪金简,而是一件祈福免灾的金简。

其一,武则天一生并不认为她有



错,反而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功臣,她在晚年平衡了宫廷内的权力之争,将江山和平归还李唐。

其二,就“罪”字而言,有两重释义:一是罪过,二是疾病痛苦的意思。

其三,金简中出现的“乞三官九府”,是一种道家治病驱邪的传统和祈福方式。

其四,武则天委托的投简人胡超是一位道士。

由此可见,金简上的“罪”指的是武则天晚年时的疾病痛苦,“除罪”更多地指向祈福解厄。

根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4月至嵩山避暑,同年5月,女皇病倒了,当时道士胡超为她炼丹治病,武则天服了丹药后,病情有所好转,心情大好,又一次于嵩山脚下的石淙河大宴群臣。此次石淙会饮,女武则天解决了长期困扰她的一个问题,即李武两姓的权力之争,在维护本家族利益的私心和稳定国家大局的矛盾中,武则天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她的身体健康也关系着政局的变化。武则天借在石淙河游历山水之际,终于做出了在其身后交还李家的决定,而李氏也答应保武家此后的荣华平安,

从而平衡了李武两家的权力争斗。

久视元年5月,武则天服道士胡超所进丹药后虽然“疾小瘳”,但推测当时女皇年事已高,身体并未痊愈,于是在天师道“三会日”的中会日七月七日这天,用道家三官手书的方式,向嵩山投简祈福消灾。

三官手书,是道教祈祷三官神的文书。三官者,天官、地官、水官也。三官九府是道教天、地、水三神及其所配官府。这是东汉时张道陵首创天师道时即有的一种祛病祈福之法。《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裴松之引《典略》中记: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由此可见,这件金简极有可能是武则天通过道教方式向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祈福所用,它是武则天为了解除晚年时的疾病痛苦而做的一件祈福消灾金简。

## 金简的成分及制作工艺

2008年,河南博物院对武则天金简的成分及制作工艺进行了无损检测和分析,通过对金简不同表征多点测量,发现金简大部分测量位置合金分布均匀,主要元素为金、银,其中金含量为90%,银含量为10%,是一件金银合金。这与目前所见唐代金器大多为金银合金的情况相一致。

由于黄金较白银更为稀少珍贵,加之银的延展性和其与金的互溶性较好,古人会在金中加银,以降低金的用量。但为使成器的成色更好,加入银的比例会有严格控制,色泽会随银含量的减少而加深,呈现出“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的不同颜色。

通过对武则天金简的制作工艺进行分析,认为其主要采用了古代金属加工技术中的锤揲、篆刻和研光技术。

根据观察,金简使用的应是加热经验锤揲工艺。经验锤揲主要是指依照经过设计的造型或图案,完全凭借工匠的经验来完成三维或二维器物造型。工匠通过控制力道来掌握器形的变化和走势,并保持器物各部分的厚薄均匀。

金简正面篆刻双阴线构成文字,文字内、外为素地,篆刻刀口周围边缘呈弧形沿刀口下陷,篆刻方法为直口型倾斜约45°阴刻而成,由整点构成文字,入篆刻凹凸有序、明暗清晰、字体突出,篆刻线条转角衔接圆滑、连贯,显示出制作工匠丰富的篆刻经验和精细的加工技术。

研光是金银器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一件加工过的金银器,经过锤揲、篆刻等多道工序,表面杂质氧化层、毛刺等缺陷会影响金银本身的光泽,只有通过玛瑙压子、皮毛、软木炭等工具进行碾压或摩擦,才能将金属的原有光泽展现出来。金简正面布满细小微痕,背面则较正面略少。可见,金简正面的研光材料与工艺与背面存在差异。

(作者系河南博物院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 沈体兰:周庄古镇走出的爱国教育家

费幸林



在“中国第一水乡”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太平桥堍西侧,有一幢高围墙三合院的清末建筑,面街临河,环境幽雅,名为“贞固堂”,其主人是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副秘书长的沈体兰。

沈体兰原名流芳,字体兰,1899年出生于周庄。当时的周庄属吴江县。沈家为书香世家,迁居周庄后,父亲沈根黄出资创建沈氏义庄小学并自任校长,专为镇上贫困家庭学生开办义务教育。

贞固堂是沈体兰幼年生活之处,父亲将家中的桌椅、书橱等家具器皿都刻上“贞固堂”字样,引起了沈体兰的注意,他就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贞固就是坚贞不移,始终如一,并告诉沈体兰“贞固”两字的出处,在《周易·乾卦·文言》: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沈体兰深记于心,他学着父亲的语调说:“贞固足以干事”。在沈体兰的一生中,他常以此鞭策自己。

1913年夏天,沈体兰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192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2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任全国青年协会学生部部长。

1931年,沈体兰应聘任上海英国教会学校麦伦中学校长,提出“建设高尚思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体意识,实行公众服务”的新办学方针,培养学生有“科学头脑、劳动身手、生产知识、革命精神”的目标。建立民主管理治校制度,聘请进步人士任教。废除宗教课,开设时事形势课,建立周会制,邀请海内外学者名人演讲。还创办民众学校、补习学校和义务学校,招收工人、店员和失学儿童入学。

1934年,学校建造室内体育馆,沈体兰把自己在周庄的部分房产变卖,得款3200元全部捐出,约占募捐总数的1/3。1935年,再建科学馆,他又积极发动募捐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沈体兰支

持麦伦中学学生的各项爱国救亡活动,并发起组织爱国社团,宣传团结御侮救国主张。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沈加入抗日救亡组织,并接受宋庆龄委托,奔波印度、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日斗争,扩大反侵略正义事业的宣传。

1942年初,沈体兰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1944年夏,随校迁至重庆。后经中共党员龚澎介绍,到曾家岩晤见周恩来,共议国事。同年9月,应邀京大校长梅贻宝之聘,往成都任该校教授兼秘书长。

1946年夏,沈体兰复任麦伦中学校长,并兼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麦伦中学学生在中共的领导下,参加全市反爱国运动,影响巨大。学校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基地,学生运动的堡垒。”(中共地下组织江苏省支部曾设于校内。)1947年—1948年,与张志让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与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组织的“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并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用英语演讲,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全文刊载于英文报刊。又与马寅初等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人权保障会”,联合28位民主教授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

1949年初,沈体兰应邀参加新政协协筹备工作,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副秘书长。10月1日应邀出席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沈体兰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华东体育学院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体委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还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常委、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会常务理事。1976年6月24日,在上海病逝。

如今,这幢高围墙三合院的中型住宅精巧别致,两个厢房的木棂窗、屋顶山尖、围墙上花窗、高耸的平屋脊,构成了丰富的立体轮廓。它与太平桥、三元楼和周围的民居,组成了一幅极具水乡风貌的图画,成为周庄最入眼的景观之一。周庄镇在贞固堂打造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传承协商民主之风,并将底层和二楼辟作沈体兰史料陈列室,陈列名人题刻和珍贵历史资料展品,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一同穿越时空隧道与历史对话。

# 文津阁秋拍将推出启功先生书法专题

本报讯(记者 付裕)文津阁秋拍将推出“丹青功德——启功先生书法专题”。

启功先生的书法以楷、行、草书为主,点画劲健,结构严谨,气质温雅,中正安舒,“书贵瘦硬方通神”在启功先生的书法中得到了完美呈现。启功先生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卓有成就,扬弃了清代以来的碑学观念而

开一代新风,“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成为当代书坛耳熟能详的格言;其“黄金结字律”理论,亦独树一帜。

此次文津阁秋拍将推出启功先生作品24件,内容包括书法自作诗、唐诗宋词、前贤句、题名题画,以及书赠友人吉言雅联等,作品来源清晰,多次出版、著录和展览。



# 四十三年迷鼎(辛)



四十三年迷鼎(辛)出土于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铜器窖藏,是记录西周册命典礼最完整的铭文之一。铭文详尽记载了典礼流程的各个环节。

其中,“授王命书”“受册,佩以出,返纳瑾圭”等细节,是册命典礼的重要内容,本铭则详加记述,非常珍贵。

四十三年迷鼎(辛) 西周晚期 器窖藏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 晚唐五代秘色瓷

杨桂梅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拈中散斗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歌给人留下一个千年的遐想,什么是秘色瓷?虽然越窑窑址的发掘一个接一个,越窑青瓷的出土也越来越多,但是谁也无法定位怎样的越器为秘色瓷。这个千年谜团终于在1987年随着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掘而露出真相。

法门寺始建于汉,原名为阿育王寺,隋代始称法门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的碑铭记载此时的法门寺已是李唐的皇家寺院,后历代翻修更名,香火一直持续到民国。1981年因塔身坍塌,才开始对废墟进行清理与发掘。唐代塔基出土的13件有《衣物帐》记录在册并且名为秘色瓷的碗、盘、瓶、碟让陶瓷学界兴奋不已,这个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也是最具体的实物与文字记载相对应的实例,揭开了秘色瓷器的神秘面纱。这批封存于咸通十四年《衣物帐》和辛于中和元年的陆龟蒙诗句《秘色越器》,当是“秘色”一词最早的文字资料。

秘色瓷实物的发现,立即引起了陶瓷学者的关注,大量研究和探讨文章纷纷出炉,关于何为秘色瓷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因为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器,虽是皇家贡器,品质优良,但釉色青绿、青黄、青灰皆有,以前对“秘色”从釉色上的猜测似乎



▲ 唐秘色釉碗

▲ 越窑秘色釉套盒

不成立。其实从宋代开始,对“秘色”之意的探讨就已经开始了。宋代曾糙《高斋漫录》中说:“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这是对五代时期秘色瓷的解读,因为五代吴越国钱氏王朝对统治区

域内的越窑具有掌控权。北宋末、南宋早期赵令畹的《侯鯖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唐《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拈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可见在宋代对秘色瓷就有不同观点。今人学者对于秘色瓷也是各抒己见,有的认为秘色瓷是区别于越窑常见的青中泛黄釉色品种的另一种青中泛湖水绿的高品质瓷器;有的认为秘色之“秘”通“密”,与当时信奉的密教有关,所以仅在法门寺供奉帐中出现;有的认为“秘色”只是对青瓷釉色赞叹的文学描述,是对越窑优质青瓷的爱称。对“秘色”之解读虽有不同见解,但秘色瓷作为高档瓷器贡于王室贵族是没有异议的。

五代吴越国时期当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时期,《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记载,钱元瓘(887-941年)在位时,曾给后唐朝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他死后随葬秘色瓷10余件,其妻马氏随葬秘色瓷44件。吴越国晚期钱弘俶(929-988年)统治时期,与北宋有18年交叉,这个时期是越窑的极盛期,官府控制的制瓷作坊的范围扩大。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记载,钱弘俶进贡了14万多件金银器陶器,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器就是这个时期越器的真容,其精巧